

廖平早期进步的政治思想

蔡方鹿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一生著述极富。但他并不是脱离社会,不问政治,为治经学而治经学的经师。受现实社会矛盾和时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在他的经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思想。

廖平在戊戌变法失败前,就提出了变法改制、因时救弊、通经致用和改文从质、学习西方的思想,这些早期的政治思想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成为当时进步的变法维新思想潮流的组成部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主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在廖平“尊今抑古”的思想启迪下作出的。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所造成的中国近代社会新旧思潮的混杂,以及廖平本人与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廖平在戊戌政变后,政治上由进步逐渐转向保守以至反动,到辛亥革命以后,更是鼓吹倒退,尊孔读经,走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去了。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变化很快,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社会几百年所走的道路。廖平的思想体现了这个特点,他的经学思想几经六变,他的政治思想也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而发生着不同阶段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廖平的政治思想是怎么样的,而应该说廖平的政治思想在哪一时期是怎么

样的,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我们试图根据廖平早期的著作来分析论述廖平早期进步的政治思想,把它与后来保守以至反动的政治思想区分开来,从而把握这位历史人物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关系。

变法改制,因时救弊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侵略我国,特别是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越发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危局,改良主义思潮进一步高涨,先进的中国人以变法和改良为政治思想武器,同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廖平通过对今文经学的研究,曲折地表达了他变法改制,因时救弊的进步政治主张。

廖平在经学研究上的见解主要有两点:一是以礼制来区别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他认为“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玉制》、《周礼》。”(《今古学考》卷下)即今、古文经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今文经学主《玉制》,古文经学主《周礼》;二是认为古文经学乃刘歆等人所伪造。他说:刘歆真“为圣门卓、操”(《古学考》)。这两点见解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价值。古文经学是儒学的正统,是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理

论基础，一旦首先被廖平宣布为伪造，这对于打破二千年来无人敢疑，无人敢违的旧传统，把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廖平以《王制》和《周礼》来区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并提出“尊今抑古”，其政治意义在于托古改制，因时救弊。他说：“《周礼》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今古学考》卷下）廖平指出，孔子面对“春秋时礼坏乐崩”（《知圣篇》）的局面，深感不安，“乃思垂教”，“笔削《春秋》”，对《周礼》进行因革损益，以成《王制》，孔子其“意在改制救弊”（《今古学考》卷下）。既然历史上的圣人孔子都可以对当时政治制度——周礼的弊病进行改革以变通之，“孔子翻经，增减制度，变易事实，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知圣篇》）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于是廖平把春秋时改《周礼》之弊与现实的政治改革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他说：“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絃更张也。”（《今古学考》卷下）由此，改良派对封建弊政的革新，要求对现实政治“改絃更张也”，就与孔子“改制救弊”的主张相符合。在廖平看来，春秋时的孔子以及当时的“有志之士”纷纷起来改周文之弊，这就象现在的维新改良人士一样，他们谈论政治，都企图“改絃更张”，另谋出路。这种古今对比的方法，把孔子改制与现实的维新运动挂起钩来。这样，廖平就从古圣人那里为改良派的现实政治活动找到了根据。

廖平认为，“由尧舜以至成周，初简陋而后文明，代有沿革。”（《知圣篇》）这就是说，历史是进化的，社会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后世对于前代必须因革损益，更法改图。他还把春秋公羊学与我国古代《易

经》的变易哲学结合起来，为改良政治服务。他说：

《易》明变化消长之天道，与《春秋》全反，一天道一人事，一循守旧职，一运用无方，一常一变，一内一外。知《春秋》而不知《易》，则拘于成法，无应变之妙。盖《易》专以通变不倦为宗旨，故欲知《易》，必先学《春秋》；既学《春秋》，不可不知《易》。既能穷《易》之精微，则内外交修，于治术方无碍。（同上）

廖平强调，《易》是以“通变不倦为宗旨”的，只有掌握了《易》的这个“精微”所在，才能够“内外交修”，治理好国家。以此，廖平反对“守常不变，泥古不通”的封建顽固派。当时的顽固派为了维护反动的专制统治，宣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改良维新。他们认为封建圣人孔子决不会“改制”，祖宗之法是万万不可改变的。廖平则认为，“合于道不合于时者，《春秋》讥之。”（《公羊补证》卷四）既然孔子笔削《春秋》时，对那些所谓合于“道”，但违背时代潮流的守旧派作了讥贬，那么，现实的改良维新当然是可以允许的。廖平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欲强，必先变法。”（《公羊补证》卷九）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鼓吹的“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反动论调。廖平还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某些质疑和指责，尽管他在根本上仍然拥护三纲五常。他说：“祖宗之成法，后世有变通之条；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谏诤之义。岂陈利弊，便为无状之人；论阙失者，悉有腹诽之罪。”（《知圣篇》）廖平主张对祖宗的成法、君父的言行“陈利弊”，“论阙失”，以变通救弊，反对顽固派以“离经悖道”、“非圣无法”以及“腹诽之罪”的罪名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廖平要求对祖宗的成法实行“变通”，对君父的言行实行“谏诤”，其政治意义在于，过去的那一套治理国家的

“成法”，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了，必须对它革除弊病，谈论错失，在此基础上，变革过去的旧东西，用新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来代替它。这个认识与当时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是相近的。

以上可见，廖平在变法与守旧问题上基本是站在维新派立场上，主张变法改制，拯救时弊的。尽管他不象康有为那样，提出变法改良的具体政治主张，也没有从以今文经议政发展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但他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中，对二千年来的儒家传统进行根本的改造，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影响了康有为和一代维新人士，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遭到了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反对。张之洞在1897年曾指责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这说明廖平在这一时期不仅与封建顽固派背道而驰，而且与代表官僚买办阶级利益的洋务派在思想上也确实存在着差距。

通经致用，学术与时代政治相结合

廖平继承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提倡“通经致用”，以“实学”来代替当时腐朽没落，但仍占统治地位的汉学与宋学，主张把学术研究与时代政治结合起来，以挽救社会的时弊。廖平生活的年代，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外敌入侵日甚一日。面临严重危机的清王朝统治者却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官僚士大夫寡廉鲜耻，沉醉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之中。大部分学者仍然株守训诂考据的汉学和崇尚空疏无用的宋学。

廖平基于对社会危机的深切感受，认识到汉学、宋学的烦琐空虚，无补于世。他主张“旧日考据之支离、理学之空疏皆须改良进步。”（《公羊补证》卷一）从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通经致用为立学本根”（《公羊补证》凡例）认为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这

是立学的根本。并指出：“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知圣篇》）强调应把经学与实用、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反对脱离现实，关进书斋的那一套传统学风。

廖平尖锐地批判了古文经学即汉学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专门从事烦琐考据的治学方法。他说：“近今风尚，不蔽文字则求琐细，一衣一冠考校累月，一草一木说以数万言，梦梦为之。……或考兵农今古，则茫然失措。”（《经话》甲编）汉学家们厚古薄今，逃避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一衣一冠、一草一木的考订。这种学问玩弄雕虫小技，结果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于现实社会毫无补益的方向，“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知圣篇》）廖平指出，这种与政治、经济联系不起来的学问，在“国家承平”之时，尝可以“借为文饰休明之具”，一旦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则“势所不行”（同上）。

廖平还批判了当时守旧学者舍本逐末，皓首穷经，“老死不能尽”的治学道路。他认为诸儒“以古文考据义理八比”作为孔经的本旨，是“不得其解”。他主张治经学要“从《王制》入手，则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知圣篇》）即以今文经学的《王制》来代替汉学考据的“小学”，这样才能避免“老死不能尽”，而“立得成果”。否则，如果“沉没于声音训诂，即使背诵如流，其于致用奚啻千里”（同上）。假若脱离实际，不问政治，埋头于音韵、训诂之学，即使背诵如流，也于社会现实相距千里。

对于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廖平作了生动的比喻，他把书法中的碑帖和卷折拿来比喻说明通经与致用。他说：

经术如碑帖，经济如卷折。以碑帖之法施之卷折，非也；不用碑帖而能卷折，亦无是

事。此事是一是二，能碑帖而不知卷折，迂儒也，且将碑帖何用？能卷折而不知碑帖，俗吏也，其卷折亦必不工。自汉以来，此事久分为二途，彻上彻下，夫谁能之？（《经话》乙篇）

廖平认为，经术就象书法中用以临摹的碑帖，而它的经世济时之用就如根据碑帖而写成的书法文字。廖平反对自汉以来把经术和它的经世济时之用“分为二途”的作法，他认为，要把通经与致用、学术与时代政治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为此，他进一步强调“通经致用为儒林之标准，汉儒引《春秋》折狱。”（《知圣篇》）把汉儒引《春秋》判案断狱作为通经致用，以经术治理国家的先例。并主张考察“所有职官封建井田学校选举兵制食货治法大端”（同上），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事务上来，从而挽救社会危机，使祖国富强起来。

改文从质，学习西方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廖平的那个时代，“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廖平在戊戌变法时提出了“改文从质”的主张，充分表达了他救国维新，学习西方的政治态度。

“改文从质”中所谓的“文”与“质”，取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质朴多，胜于文华，则如野人；文华多，胜于质朴，则如史官。文华和质朴相半，然后可以成为君子。廖平在《知圣篇》里解释文、质的含义时指出：“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中国古无质家，所谓质家指海外。”就是说，文指中国，质代表西方。廖平引用文质之说是为了表示中国文弊已深，要救文弊，只有改文从质，学习西方，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廖平指出，中国二千年来的统治方法，由于以封建的大一统来实行治理，结果造成文胜于质，弊端百出，积重难返，如此下去，中国的孔子席位终将被西方的耶稣所代替。他说：

中国由秦汉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余年积重弊生，别求一质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然则所谓改文从质亦经空说，在今日固无自救之术，中国将无以自立，且使尼山之席终为耶氏夺耶。（《四益馆杂著·改文从质说》）

既然中国的文弊已深，积重难返，而且今日中国“固无自救之术”，那么，救中国之文弊的出路何在呢？廖平指出：“极古今中外之变而求一与文相对相反之质，非泰西而何？”（同上）只有从今日的西方那里，才能找到解救中国文弊的质朴来。“质家者何？今之泰西诸国是也。”（同上）廖平巧妙地利用孔子的文质之说来表达他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这与那些盲目排外，愚昧保守的封建顽固派发生了矛盾。为了反击守旧势力，廖平把顽固派的观点作为驳斥的对象。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他们认为，中国即使有“文史之弊”，也不能用“野人之质而救之”。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文明都看成是有害的，但他们又认为，“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吾宁终守文史之弊，穷困以终而不辞，终不愿用夷变夏，自居于野人也。”（同上）顽固派把西方看成是野人的国度，他们宁愿穷困到底，也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这种愚昧保守到了可笑的程度。与顽固派相反，廖平反对“闭关自守”，“深闭固拒”的作法，他认为既然“中国文弊已深，不能不改，又不能自创”（同上），那么，只有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师。他说：“百僚当北面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之治功。”（同上）学习西方治理国家的方法，走富强文明之路。廖平还指出，中国与西方相比，已经“相形见绌”，所以要对外开放，不要把

自己捆绑在小天地里，妄自称大。他说：“中国自号文明，闭关自守，未见不足。一自通商，神州遂触其短，相形见绌，所宜修改者甚多。”（同上）廖平反对闭关锁国，主张通商，对外开放，以此学习西方的长处，克服中国的短处，使祖国富强起来，这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特点。廖平看到，“中外各自有长短”，中国落后见绌之处，“所宜修改者甚多”。应该从哪些方面向西方学习呢？

经济上，廖平提出“农工商贾诸学皆当取法外人。”（《公羊补证》卷七）要求发展工农业和商业，修筑铁路，制造轮船，学习外国的工程管理法。他说：“近来外国工程律法各有进境，中所当仿，以为工程进步。”（《公羊补证》卷十）学习外国在“管理铁路河道海口”时“务必照章”，“定船尺寸比例及时样等事”，“以上俱本国工程家应遵之例”（同上）。廖平认为，“富强之学，中不如外。”（《公羊补证》卷七）要学习西方的这些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工农业和商业，这样就能“国势强则海外自戢”（同上）。使中国强大起来，从而免遭列强的侵略。从经济上向西方学习，这是廖平学习西方的主要内容。

文化教育上，廖平主张废除八股，学习西方的“立校讲学”。他说：“师儒一如该国立校讲学，盖天下学问与政治同，困小则劣，通博则廉。”（《改文从质说》）提出向西方学习，立学校、废八股，认为学问与政治一样，都应该提倡“通博”，反对“困小”，即打开眼界，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并提出以“策论之易八比试帖”（《知圣篇》），用策论来代替八股文的考试方法。廖平还主张仿照西方工厂的分工制原则，将其运用到学校教育上，为中国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说：“必仿分工例，终身专门，终日专习，乃能有成。”（《公羊补证》卷一）对于

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廖平强调，要“以通言语、识文字为第一要务”（《公羊补证》卷八），以此加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以振作国势。他说：“当此万国交涉，时事维艰，不有言语一门，何能振作？”（《公羊补证》卷七）。

政治上，廖平虽然没有具体地提出学习西方的哪些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但他认为西方的政治法令也有其长处。他说：“考其政治法令，其得者，颇有合于《王制》、《周礼》。”（《改文从质说》）只是他把西方政治法令的长处牵强地比附于中国古代的《王制》与《周礼》。廖平主张要详细地考察西方诸国“政治兵农贫富强弱之故”（《公羊补证》卷八）。认为这是“当今之急务”，要“精熟无遗”，表达了他学习西方政治军事的愿望。廖平还引用《劝学篇》的话说：“《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知圣篇》）廖平认为“政高于艺”（同上），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也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他把学习西方的政治与读《王制》结合起来。他指出：“读《王制》则学西政之义。”（同上）尽管牵强，但仍具有学习西方政治的含义。

在廖平看来，学习西方是挽救中国社会危机的出路，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二千年来“治法”之弊，使中国走上文明富强的道路。廖平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历史的局限

戊戌变法失败前，廖平提出了变法改制、通经致用和学习西方的思想，这一时期廖平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为变法维新运动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廖平这时的政治思想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批判旧学带有妥协性。廖平当时的政治思想，处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过渡的中间环节，而倾向于要求改良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刚从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它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廖平在批判封建旧学，提出变法改制主张时，具有严重的妥协一面。他批判汉学和宋学，然而却美化孔子，把孔子尊为“素王”，称为“生知”。他说：“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知圣篇》）廖平把孔子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孔子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百世可以推行”（同上）的。他利用封建圣人孔子的招牌来宣传变法改制，以文质之说来表达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这种古为今用的手法虽有某些进步和可取之处，然而一定的思想理论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什么超越时代，通行百世的理论。廖平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固然可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同时也反映了改良主义思想理论的薄弱。

(二) 缺乏具体的政治改革主张。从廖平的思想体系来看，他是主张变法改良，挽救危亡的。但是廖平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今文经学的理论研究上，比较地遵守今文家法，虽然他也考虑到借助孔子变法救弊，学习西方，然而他不象康有为那样，把学术思

想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变法措施。可以说，廖平主要是今文经学的理论家，而康有为则是把今文学习的理论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政治活动家。这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其渊颇出自井研（廖平）”（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而他的社会影响却大大超过廖平的原因。

(三) 保留封建的纲常伦理。廖平虽然对封建主义的弊端作了批判，也主张改文从质，学习西方。但他又认为，“中外各自有长短，弃取是为交易。”（《改文从质说》）中国和西方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应该互相弃取。中国的长处在于“形上之道”，西方的长处是“形下之器”。所谓“形上之道”，即封建的伦理纲常。廖平认为，封建的纲常伦理是应该保留而不能去掉的。他说：“三纲之说非明备以后不能兴，既兴以后则不能灭。”（《知圣篇》）这表明廖平的思想，即使在比较进步的时期，也不能和封建顽固派完全划清界限。

由于这一时期廖平的政治思想存在着以上局限，所以在戊戌政变后，政治风云的变化使得廖平的政治思想由进步逐渐转向落后以至反动，最后和康有为一样，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倒退，成为历史车轮的拦路石。

（上接第63页）

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网部·罢》。

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讎》。

⑪“快”的“快急”义起得很晚。但晋以后文人作品中已广泛使用。据此推测，《方言》成书之时至少“快急”义已在口中使用。

⑫钱绎《方言笺疏·卷三》。

⑬有人认为“乱”的“动荡不安”、“治理”两义也相反。就是说，即使“乱”没有“造反”义，仍然是反义同词。果真这样，他也得承认“动荡不安”与“管理”相反。就是说“治②”与“乱①”相反，又与“乱③”相同；关系线又相交，恰好与本文的推断相符。

⑭参波兰语义学家沙夫所著《语义学引论·语词指号的特性》。